

君士坦丁大帝时代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
JACOB BURCKHARDT 著

THE AGE OF CONSTANTINE THE GREAT

宋立宏 熊莹 卢彦名 译

宋立宏 审校



上海三联书店

君士坦丁大帝时代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
JACOB BURCKHARDT 著

THE AGE OF CONSTANTINE THE GREAT

宋立宏 熊莹 卢彦名 译
宋立宏 审校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著;宋立宏,熊莹,卢彦名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1

(三联精选)

ISBN 978 - 7 - 5426 - 5758 - 9

I. ①君… II. ①雅… ②宋… ③熊… ④卢… III. ①古罗马—历史—研究 IV. ①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78095 号

君士坦丁大帝时代

著 者 /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

译 者 / 宋立宏 熊 莹 卢彦名

审 校 / 宋立宏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柴昊洲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 - 22895557

印 刷 / 江苏省常熟人民印刷厂

版 次 /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 × 960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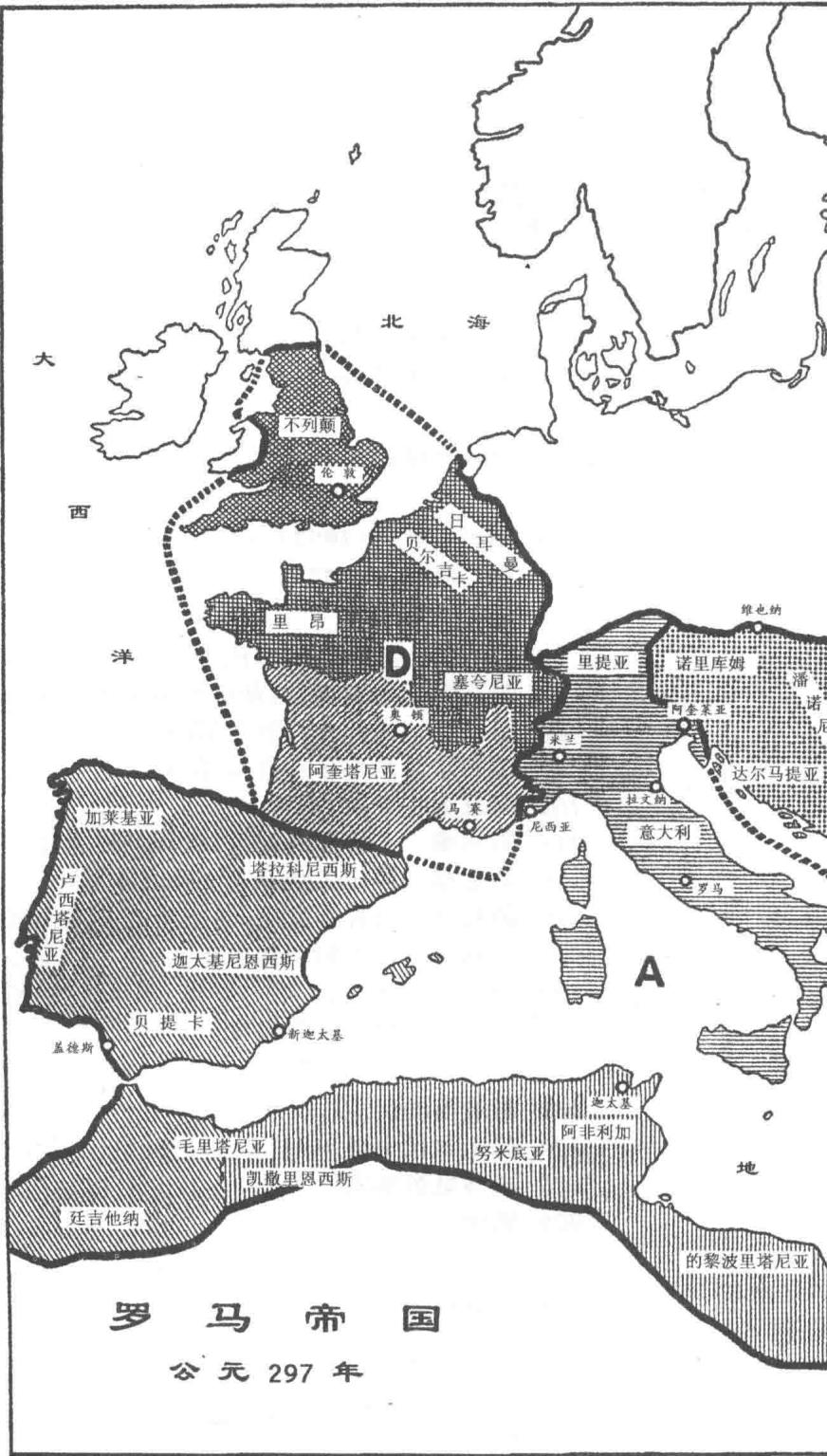
字 数 / 350 千字

印 张 / 24.7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5758 - 9/K · 408

定 价 / 8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520 - 26013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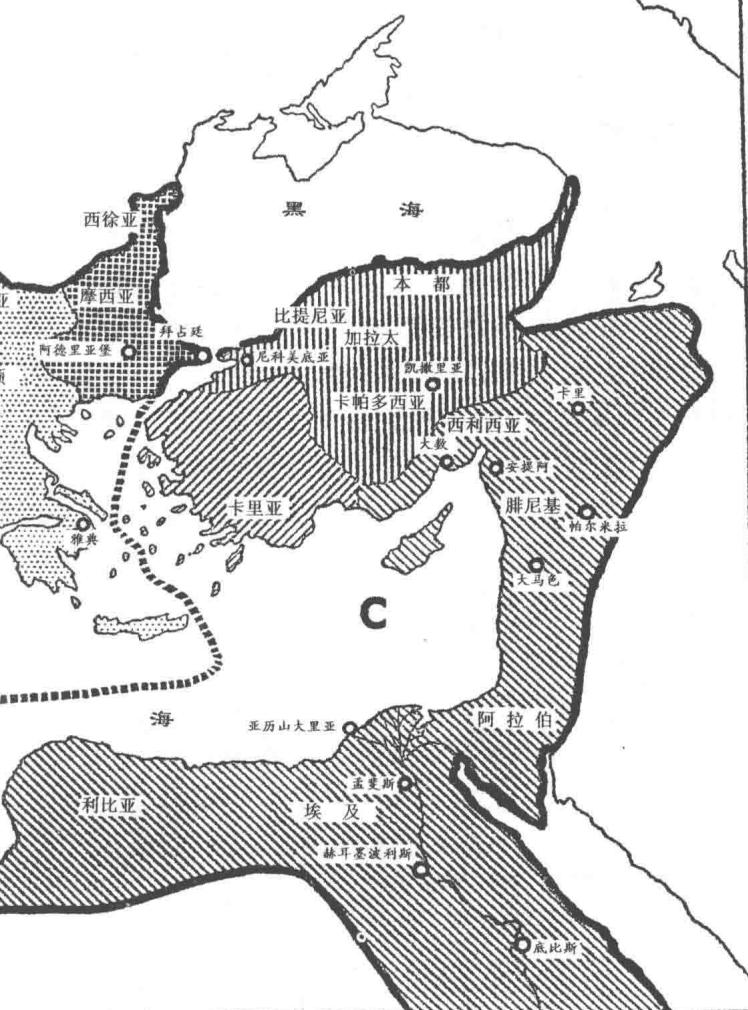
A 意大利辖区

B 伊利里亚辖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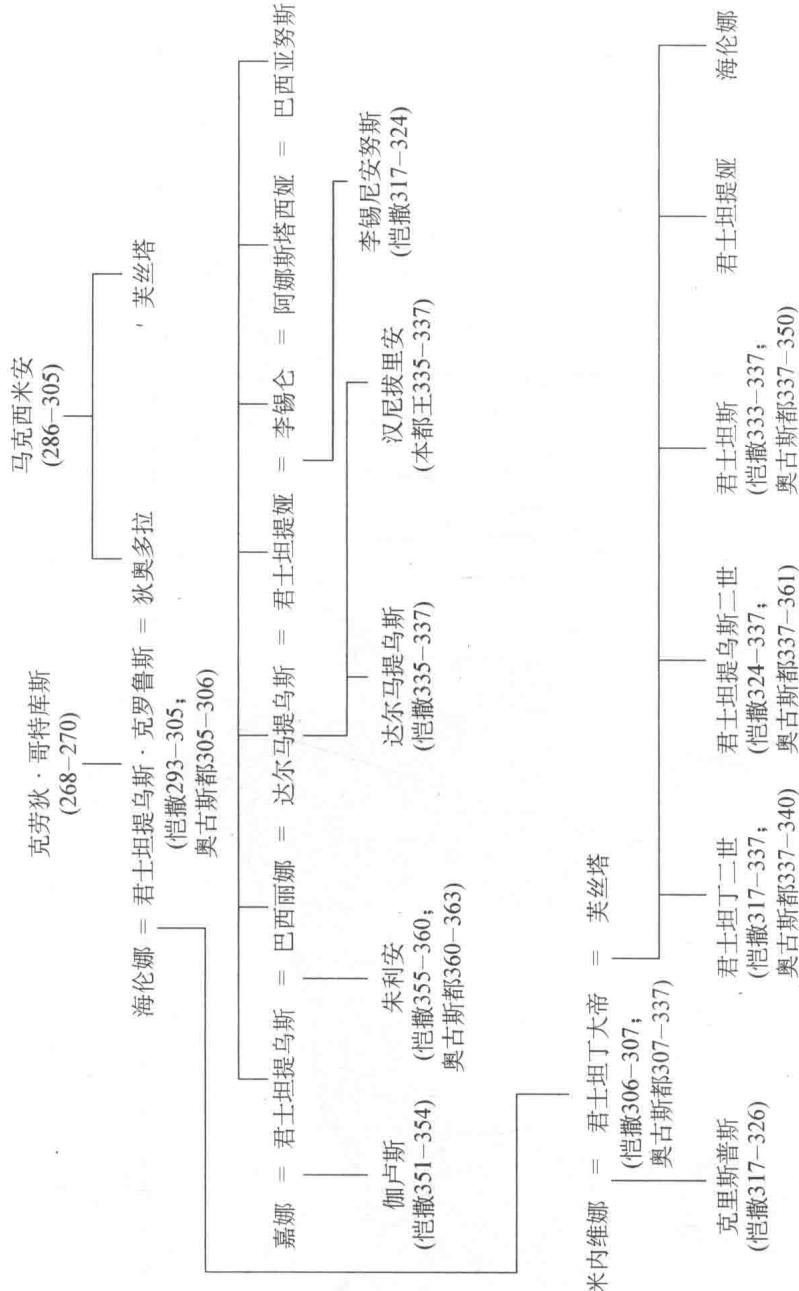
C 东方辖区

D 高卢辖区

东方	不列颠
本都	高卢
亚细亚	维埃纳
色雷斯	意大利
摩西亚	西班牙
潘诺尼亚	阿非利加



君士坦丁家谱



中译本序言

黄 洋

看到雅各布·布克哈特这个名字，读者自然而然会想到文艺复兴，因为正是他的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对文艺复兴作了最为经典的诠释。除了少数专门研究者之外，恐怕很少人会把他同眼前这部著作联系起来。这个事实令人遗憾地但却明确无误地表明，我们对作为“19世纪最为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①的布克哈特，是多么的缺乏了解，或者说我们的了解是多么片面。实际上，布克哈特并不仅仅是文艺复兴研究的一位专家，他所关注的是欧洲全部的文化史和文明史，他对欧洲文化几个最为关键的阶段，即作为奠基的古典时代，由古典文明向中世纪文明转变的晚期罗马帝国，以及由中世纪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的文艺复兴时期都有着深入的研究和深刻的见解，并且对后世这几个领域的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从研究范围之广泛，并且在所有涉足领域都有极高建树这一点来说，历史学家中无有出其右者。有鉴于此，似乎有必要花费一些笔墨，对作为历史学家的布克哈特，他撰写本书的出发点，以及本书在其全部史学中的位置，略作一些介绍。

雅各布·布克哈特于1818年出生在瑞士小城巴塞尔的一个世族之家，父亲是新教教士。巴塞尔位于瑞士西北边陲，同德国和法国相邻。这里是欧洲的心脏地带，属于基督教新教文化的核心区

^① Peter Burke语，见Peter Burke为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企鹅丛书英文版(Jacob Burckhardt,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0)所作的“导言”("Introduction")，第1页。

域,卡尔文教派的影响尤为深远。同时巴塞尔也具有深厚的人文传统,瑞士最古老的大学巴塞尔大学即位于这里,它創建立于1460年,正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如火如荼展开的时期。北方文艺复兴的最著名人文主义者埃拉斯莫晚年也在里居住,并终老于此。此外,地理学家塞巴斯第安·明斯特(Sebastian Münster)、数学家莱昂哈德·欧勒(Leonhard Euler)、瑞士著名的数学家伯努利、画家小霍尔拜因也曾居住于此。完成中学学业后布克哈特在巴塞尔学了两年新教神学(1837—1839年),打算接过父亲的衣钵,成为一名教士,但他很快发现,历史学更能打动他的心,乃说服父亲同意他到柏林大学学习历史。此时史学大师兰克已经声名鹊起,成了德国历史学的翘首。他的第一部史学杰作《教皇史》已于1834年出版第1卷,第2和第3卷也于1836年出版,这部著作很快为兰克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布克哈特已然阅读了《教皇史》,并且能将其中的一部分铭记于心。他之所以决心进柏林大学,就是为了跟随兰克学习当时最新的历史学方法。在动身之前,他曾尝试找人向兰克推荐他,但没有取得成功,不过却获得了向艺术史教授弗兰茨·库格勒(Franz Kugler)的推荐^①。怀揣着这份推荐信,21岁的布克哈特于1839来到了作为德国学术中心的柏林大学,他在那里学习了四年,中间有一个学期去了波恩大学。

柏林的三位教授对布克哈特的学术取向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当然是兰克。他们两人的学术承继关系并不是一目了然,除了布克哈特后来的学术取向大不同于兰克之外,部分是因为他们的个人关系并不融洽。论者均提及,布克哈特并不喜爱他的这位老师,不过这主要是就个人性情、政治和社会态度而言。对于兰克的历史研究,布克哈特还是推崇备至的。除了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和1841年春季在波恩的那个学期之外,他从没有错过兰克任何的课

^① 参见 Felix Gilbert, ‘Jacob Burckhardt’s Student Years: The Road to Cultural Histor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47, no. 2 (1986), 249—274, 尤见第253页。

程和讨论班(seminar)。不仅如此,在兰克的讨论班学习时,布克哈特还提交了两篇长篇论文。前一篇是研究8世纪法兰克人国王卡尔·马特尔(Carl Martell)的论文,后一篇则是研究德国天主教教派领袖霍希斯特登(Conrad von Hochstaden)的论文。两篇论文都使用了“民族精神”(Volksgeist)这一概念,而这是兰克十分偏爱的词语,后者的影响可见一斑。在《卡尔·马特尔》一文的开头,布克哈特宣称:“本文的目的是确立事实。”^①这一兰克似的宣言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他采用的是兰克的研究方法,即占有全部原始资料,对其进行细致的甄别,并在此基础上客观地描述事件的过程。对于布克哈特的这两篇论文以及他后来出版的《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也就是本书——兰克其实都赞赏有加,并推荐慕尼黑大学给予他教授席位。布克哈特还在其他地方表现出对兰克历史学的推崇。在1841年夏天,他和波恩大学的另一些同学送给他们的老师兼朋友、波恩大学神学教授歌特弗里德·金克尔(Gottfried Kinkel)一件生日礼物,即是兰克的《宗教改革时代的德国史》的第一卷。许多年以后,在老年的时候,布克哈特准备了一份自己去世后在葬礼上宣读的生平介绍,其中写道:“我很幸运地在兰克的讨论班上提交了两项有分量的研究,并且很幸运地得到了大师的赞许。”^②可见布克哈特从未否认兰克对他的影响。

另一位对布克哈特产生重要影响的柏林教授是弗兰茨·库格勒。可以说库格勒是布克哈特的精神导师,这不仅仅是因为有人将他推荐给了库格勒,还因为他在中学时代就表现出来的对艺术史固有的兴趣。在柏林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布克哈特修读了库格勒的建筑史课程,并且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库格勒认为,艺术是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和一个时代的政治、思想观念以及文化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要理解一件艺术作品,就必须了解它所产生的时代,即艺术作品赖以产生的文化环境:人们的思想观念,当

^① Felix Gilbert, 前引文, 第257页。

^② 同上。

时的社会政治背景等。布克哈特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因而从对艺术史的兴趣导向对文化史的研究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在柏林大学学习期间,布克哈特就已经明确了自己进行文化史研究的趋向。在1842年3月21日致金克尔的一封信中,他说自己缺乏描绘人物和事件的天赋:“于我而言,背景是最主要的,而背景是文化史的主题,我想要致力于文化史的研究。”^①这不能不说受了库格勒的影响。当然,在讨论这一点时,还应该提及另一个人的名字,那就是古典学家奥古斯特·伯克(August Boeckh),当时他是柏林大学最为著名的教授之一。布克哈特在入学后的第一学期修读了伯克的或可译作“希腊古代史”(“Greek Antiquities”)课程,这不仅培育了他对古典文化长足的兴趣,而且还影响到他对历史学的认识。伯克提出,应该对希腊历史进行整体的把握,描述历史事件发生的条件和环境,因而他提出了“文化史”的概念。他还将历史学分为两类,一类是注重行动、描述事件的历史学;另一类是注重背景、描述事件发生的环境与条件的历史学。这一区分令布克哈特印象深刻,他所说的“背景是文化史的主题”,很可能就是得到了伯克的启发。时隔三十年之后,在其《希腊文化史》讲义中,他仍然提到了伯克的“了不起的课程”^②。伯克毕生的计划是撰写一部书名为《希伦》(Hellen)^③的希腊文化史,不过他没有能实现自己的夙愿。布克哈特后来开设了希腊文化史的课程,并且也曾计划出版他的讲义,不能不说都和伯克有关,后者的影响可见一斑。

1843年,布克哈特回到巴塞尔,将他为兰克的讨论班而写的《卡尔·马特尔》作为博士论文提交给巴塞尔大学,以此获得了该校的博士学位,之后他留校任教。1853年,布克哈特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就是这部《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两年之后,他又出版了

① Felix Gilbert, 前引文, 第249页。

② Jacob Burckhardt, *The Greeks and Greek Civilization*, edited by Oswyn Murra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p. 3.

③ 相传希伦是希腊人的祖先。

一部题为《导游》(Cicerone^①)的意大利艺术指南,此书后来广受好评。这两部著作使布克哈特赢得了一个教授职位。1855年,当苏黎世理工学院成立之时,他被任命为建筑与艺术史教授。正是在这里他写出了自己最为杰出的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1858年,布克哈特回到巴塞尔大学,担任那里的历史学教授,从1874年起还兼任艺术史教授。此后他再也没有离开过家乡,而且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于1860年出版之后,他将主要的兴趣与精力放在了教学之上,直至去世为止,很少再著书立说。

综观布克哈特一生的学术实践,可以发现他的主要兴趣集中于文化史和艺术史,而尤以文化史为最,就像他少年时代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他的第一部著作《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也是他书写文化史的第一次主要尝试。虽然这部著作的内容非常广泛,从3世纪罗马帝国的政治生活、宗教崇拜和文化生活,到君士坦丁大帝的政治和宗教政策、基督教的兴盛;从日耳曼人诸部落的生活习俗、到萨珊波斯帝国的政治与宗教等,几乎无所不包,但布克哈特的出发点是力图从文化史的角度,对君士坦丁大帝的这个时代做全面的扫描和理解。正如在1880年他为该书第二版所写的前言中特别强调的:“近三十年前,在收集相关材料和着手写作本书时,作者心中的目标不是写一本面面俱到的历史记述,而是想从文化史的角度对书名所指的重要过渡阶段进行浑然一体的叙述。”他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更是奠定文化史地位的名作,全书主要的篇幅都用于描述文艺复兴时期的精神和思想文化。在学术著述之外,他讲授的课程也包括文化史。最迟在1864年,他就萌生了开设一门希腊文化史的念头。考虑到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对希腊史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个想法是自然而然的。经过许多年的准备,他从1872年秋季开始讲授“希腊文化史”,后来他仍然说,这是自己“最喜爱的课程”(Lieblingskolleg)。布克哈特也曾考虑将课程讲义修

① 原文特指具有西塞罗般的古文化知识和口才的导游。

订出版，并为此而修订了前一半的内容，但最终还是决定放弃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和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历史学格格不入，不愿意在年老的时候招致非议。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他流露了自己的这种想法：

不，我的朋友，像我这样一个处于行业兄弟会之外的可怜的陌生人不敢这么做。我是个异端分子和浑噩无知的人，我的不太靠得住的观点会受到那些“极为博学之士”的严厉对待。……我老了，需要安宁。^①

因此他立下遗嘱，嘱咐将他的大部分讲义销毁，而将希腊文化史的讲义遗留他的侄子雅各布·奥厄里(Jacob Oeri)，条件是其中的“任何一部分都不得出版”。布克哈特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后来在他去世后，他的侄子违背他的遗愿，于1898年开始出版《希腊文化史》，第二年德国声名显赫的古典学家维拉莫维兹(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就提出了措词极为严厉的批评，他说：

如果我不指出雅各布·布克哈特的《希腊文化史》……并非为学术而作……没有能就希腊宗教和希腊城邦提出任何值得一看的东西……我会认为是一种懦弱……^②

当然，布克哈特此书后来的影响表明，维拉莫维兹的批评是有失公允的。时至今天，我们对希腊文化一些根本特征的理解实际上恰恰是来自于布克哈特的这本著作。

从另一个侧面来看，维拉莫维兹的批评反映了布克哈特和他那

^① 见 Oswyn Murray, ‘introduction’ to Jacob Burckhardt, *The Greeks and Greek Civilization*, p. xxxiv.

^② Oswyn Murray, ‘introduction’ to Jacob Burckhardt, *The Greeks and Greek Civilization*, p. xxxiv.

个时代大多数历史学家之间根本性的分歧。19世纪的欧洲历史学深受科学实证主义的影响,以兰克为代表的历史学家提倡以实证的方式客观地还原历史,因而在历史研究中尤其注重史料和文献的全面把握,以及史料的细致考订。另一方面,黑格尔哲学思想也在19世纪的历史学中打上了其烙印。历史学家们相信他们能够通过对过去的研究,而抽象出和把握住历史发展的规律。布克哈特对两者都不能接受,他认为,历史学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它具有主观性,甚至带有想象,用他自己的话说,历史是“所有学科中最不科学者”^①。对于同样的事件,不同的历史学家会进行不同的解释,不同的叙述。在《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的首版序言中,他就已经表达了自己的这种历史观,他写道:

通史著作可以在根本前提和目标方面留有观点分歧的余地,同样的史实可能在一个作者看来基本而重要,但在另一个作者眼中不过是乏味透顶的垃圾。因此,本书作者很清楚,他的处理方法可能被责难为主观的。更安全的方法或许是写一本关于君士坦丁的新历史,对所有现存叙述进行批判性考察,并为全书配上适量原始资料引文;但本书作者以为,这样写无法产生内在吸引力,而只有这种内在吸引力才能报答所付出的每一份努力。这并不意味着作者对迄今为止处理这些材料所使用的各种方法有任何负面评价;如果允许我们献上的供品在阳光下拥有小小的一席之地,足矣。

在我们今天,历史的多元解释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同,但这样的认识是在经历了对于历史实证主义的长久反思之后才获得的。而对于布克哈特而言,这样的思想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他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称为一篇“严格意义上的散论”(Versuch),并且

^① Jacob Burckhardt, *Reflections on History*,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79, p. 121.

进一步解释道：

也许，任一特定文明的轮廓在每个人眼里呈现的都是一幅不同的图景；而在讨论作为我们自己文明的母体，而且直至今日仍然对我们施加影响的这个文明时，作者和读者在任何一点上都受到个人判断和情感的左右，就更是不可避免的。在我们不揣冒昧地走进的这个汪洋大海中，可能的道路和方向有很多；本书所使用的研究材料，在别人手里，不仅很可能受到全然不同的处理和运用，而且也很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①

在这里，作者的主观性、读者的主观性都得到了充分的认可。对于抽象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或者对于历史的任何哲学性的理解，布克哈特也都持怀疑态度。他说：“历史哲学是个怪物，是矛盾的概念；因为历史建立协调关系，因而是非哲学的；而哲学建立主从关系，因而是非历史的。”^②

这里有必要对布克哈特的“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概念略作一些探讨。当伯克提出“文化史”的时候，甚至当布克哈特进行其文化史写作的时候，“文化史”还是一个相当新的概念，尚未形成一个得到认可的或者确切定义的历史学研究领域，对于不同的学者而言，文化史的含义亦不相同。布克哈特的文化史概念并不容易把握。从其著述来看，他大约在两个层面上使用“文化史”这一概念。其一是狭义的，他说“文化”可定义为“那些同时发生的、且不具普遍和强制性权威的精神发展的总和”^③。然而在把文化史作为研究领域的时候，他似乎是采用了一个广义的文化史概念，文化

①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正文第1页，译文根据英译本有所修改。

② Jacob Burckhardt, *Reflections on History*, p. 32.

③ Jacob Burckhardt, *Reflections on History*, p. 93.

史并不仅仅限于精神和思想活动,而是指一个时代总体的历史面貌,更接近英文中或者我们所说的“文明”。这种文化史的理解在《君士坦丁大帝时代》里体现得尤为明显,但也贯穿了他后来的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以及《希腊文化史》。也许这也是为什么在后两种著作的英译版中,译者不约而同地把他所使用的“文化”(Kultur)或者“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翻译成了“文明”(civilization)^①。与此同时,布克哈特的文化史几乎总是一个时代的幅图景,着重于对一个时代的整体景象的描绘,就如同一幅画,而不侧重于叙述历史过程和或者历史事件。这种对文化史的理解当然是和他对历史的总体认识分不开的。在布克哈特的思想中,历史是三个因素交织和互动的结果,他称之为“三种力量”,即政治、宗教和文化。在1868至1885年间,布克哈特曾开设专门课程,讲授他关于历史的这三种力量的认识,相关的讲义在他去世后收录在《历史沉思录》中发表。布克哈特认为,在不同的时代,政治、宗教和文化这三种力量所起的作用并不相等,其中之一会起到决定性作用,从而主导其他两者,并形成了这一时代的特性。仍然借用他自己的说法:“有些主要是政治时代,有些主要是宗教时代,最后还有一些似乎是为文化这一伟大目的而生的时代。”^②而在他看来,像希腊城邦时代和文艺复兴时代是典型的为文化而生的时代。布克哈特这种三分的历史观影响到他的历史写作,其著作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三个方面进行架构的。在《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中,仅最后三章用于讨论君士坦丁的统治和基督教的发展,前面则用了七章的篇幅来描绘君士坦丁时代发生深刻转变的历史背景,对此他正是从政治、宗教和文化三方面来展现公元3世纪的历史图景的。他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和《希腊文化史》,同

^① S. G. C. Middlemore的经典英译本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译作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而 Oswyn Murray 主编的《希腊文化史》英译本译为 *The Greeks and Greek Civilization* (Sheila Stern 译)。

^② *Reflections on History*, p. 60.

样是围绕上述三方面展开的，所不同的是他把作为二者主题的两个时期看成是伟大的文化时代，因而更为注重文化方面的描绘。

不过，虽然布克哈特发展了认识历史的一般性理论，但是他所感兴趣的从来不是普遍的文化史这个领域，而是欧洲这一特定文明的文化史，或者说这一文明的总体历史。他对于希腊城邦时代、君士坦丁时代和文艺复兴时代的关注并不是偶然的，或者说是一种巧合，而是体现了他理解整个欧洲文明的一种努力。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还必须回到他从事历史研究和文化史研究的出发点。和他同时代的大多数历史学家不同，他对历史学的兴趣不是为了仅仅弄清过去的历史事实，或者掌握渊博的历史知识，而是为了理解和把握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欧洲文明。在这一点上，他和巴塞尔大学的年轻同事尼采不无相似之处。在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剧烈震荡之后，欧洲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习以为常的君主统治逐渐为民主化的政治生活方式所取代，布克哈特的家庭所属的贵族阶级正在丧失其特权，政治上的地震也带来了文化和心理上的变化，一个大众的时代正在来临。年轻的布克哈特发现，神学不能为他提供解释这一切变化的答案，由此他转向了历史学的研究。在写给友人金克尔的一封信中，他曾说道，他不能肯定自己是否能够成为历史学家，但是理解他那个时代如何发展而来的强烈愿望驱使他学习历史。^① 然而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他逐渐意识到兰克的历史研究取向并不是理解现代世界的最佳途径，因而转向了文化史研究。也正是这个强烈的愿望促使他不仅去研究现代世界的形成，而且去研究作为西方文明根源的古典文明，以及古典文化向中世纪文化的转向。因而，正像本文开头所说的，布克哈特所关注的是欧洲全部的文化史和文明史，是探询欧洲文明的发展和变化，用一位学者的话说，他是“欧洲文明的病理学家”^②。这也是为什么本文的开头宣称，布克哈特的研

① Felix Gilbert, 前引文, 第 269 页。

② 见 Gottfried Dietze, ‘Introduction’ to Jacob Burckhardt, *Reflections on History*, p. 15.

究范围之广，而且在所涉足领域都有建树，在历史学家之中无有出其右者。在他之前，爱德华·吉本的历史研究构想之宏大、气势之磅礴，已几乎无人能够超越，但吉本试图回答的仅仅是一个问题，那就是古典世界的衰落。布克哈特从一个问题入手，却对欧洲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几个关键问题，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当然，现代世界的形成以及现代人的出现这个问题成就了布克哈特作为伟大历史学家的英名，不过虽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是王冠上最为耀眼的一颗明珠，我们也不应忽视王冠本身的光彩夺目。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在本书出版一个半世纪之后，学者们对于君士坦丁及其时代的研究都更为细致和深入。在许多的细节问题上，布克哈特可能早已为后来的研究所超越。同时，大部分的专门研究者也许不再接受布克哈特提出的一个主要观点，即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给予其正统宗教的地位，纯粹是出于建立和维护其统治的需要，而不是因为他的信仰。人们认为，他的这种解释明显带有理性时代的烙印。即使如此，布克哈特的这部著作对当代历史研究的启发意义仍然是非常明显的。从最广阔的视野对一个时代作全景式的扫描，也许可以说是布克哈特在本书中体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方法。当代西方历史学研究的一个突破是确立了“晚期古代世界”(Late Antiquity)这一研究领域，学者们一致认为，应该把包括波斯和伊斯兰阿拉伯文明在内的诸文化都纳入研究的视野，而在笔者看来，这不能不说受了布克哈特的影响。